

中国当代

ZHONGGUO DANGDAI

教育思潮

JIAOYU SICHAO

1949—1989 ▼

袁振国●编

主编 魏承思

副主编 陈昕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中国当代教育思潮



949-1989

袁振国 ● 编

主 编：魏承思

副主编：陈 昕



责任编辑 赵立新
封面设计 陶雪华

中国当代教育思潮

袁振国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3 字数: 618000

印数: 1—2000

ISBN7-5426-0362-0/G·59

定价: 12.00元

主 编：魏承思

副主编：陈 昕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沪宁 尹继佐 朱学勤 李 昉

吴修艺 杨建文 杨晓榕 严搏非

袁振国

60kfo/21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前 言

人类的思想像条河，奔腾起伏，永不停息。有时候缓缓流去，平淡无奇，只是偶尔有几束水花溅起，那便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杰出思想；有时候汹涌澎湃，一泻千里，那便是一个时代千百万人思想汇集拢来的社会思潮。可是，在以往的人类思想史著作里，只有对思想家个人的研究，很少对一个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全面考察。杰出思想家的思想固然是一代思想之精华，但在当时又往往会湮没无闻，只到后世才被理解和发现。可以说社会思潮比个别思想家的思想更深更广地反映了一个时代思想的真正面貌。因此，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探寻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必将使思想史研究领域发生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社会思潮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受一定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的。由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大致相同或相似，由此产生的思想、愿望和情绪才会自然而然地汇合成为一股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宏观反映。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都会在社会思潮中表现出来。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教育的、文艺的、学术的发展动向都会汇聚到社会思潮中来。社会思潮不但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力。十年“文革”期间，那股极“左”思潮曾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混乱和倒退。十年改革以来，磅礴于神州大地的改革思潮则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伟大复兴的希望。社会思潮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凡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思潮是没有生命力的，也许它来时铺天盖地、浊浪排空，但在整个人类思想长河中终归是昙花一现。凡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推动着历史前进的社会思潮，即使一时被压制、排斥和责难，但它包含的真理却是永不泯灭的。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不同于社会心理，但又形成于社会心理；它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但又离不开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不明确的、自发的反映形式，社会心理表现为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等。社会意识形态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反映形式，它具有明确的分工、相对稳定的各种形式，如艺术、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等。它主要是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经过专门努力和自觉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相比较，它更多地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它或是以某种思想流派为形式，或是以某种理论观点为旗帜，而不是一种纯粹自发的心理状态。社会思潮从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意向中酝酿形成，它要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激发和引导。例如中国社会存在着“权威崇拜”的心理，但是如果没有过分夸大领袖作用的理论宣传，就不可能形成现代迷信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相比较，它更多地积淀着心理的因素，虽然人们常以某些个人的思想或某部著作作为思潮形成的标志，例如恩格斯曾经把但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思潮兴起的标志，但思潮决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能否广泛流传，成为支配人心的社会思潮，除了有赖于它在当时当地被社会所需要的程度外，还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心理，能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例如苏联经济界把追求高速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固有特征的理论，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种主要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中急于求成、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心理状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社会心理只是自发地、分散地反映了人们各自的利益要求。社会意识形态则是一定群体利益的理论表现。它能够帮助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因此，社会心理只有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才具有实际意义。社会心理要上升为意识形态，一般都要经过社会思潮的“蒸馏”过程，使其中包含的理性因素，由潜藏的变为明显的，由分散的变为集中的，由单一的变为整体的，从而为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料。社会意识形态要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必须和社会心理融合起来，进入人们心灵的深处，成为人们的信念和信仰。但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化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它首先必须转变为某种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思潮，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造舆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为人们普遍接受和信仰，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之后，才能在这个社会真正占有统治地位。封建主义思想是如此，资本主义思想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是如此。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普遍性、无主体性、曲折性和时代性等特点。所谓普遍性即是说，虽然社会思潮是无数个人思想意识的汇集，但它不是各个个人思想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撇开了个人思想意愿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因素，以一种普遍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社会思潮是一种群体意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体意识。诸如家庭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人们的意识和要求。社会思潮则普遍存在于许多群体之中，往往可以为许多家庭、团体、阶层、民族、阶级所共同接受。所谓无主体性，即是说它不像其他的意识活动（包括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那样总是存在着意识的主体和客体。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确定社会思潮的意识主体，它像江河的潮水一样，由这个群体涌向另一个群体，并且往往超越时空的界限。一种思潮产生之后，不但对当时当地的人群产生影响，而且经常会波及四面八方，绵延无数世纪，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的人所接受，如民主思潮，就是如

此。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并赋予它以自己阶级的特殊含义。社会思潮发展的曲折性一方面是指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新旧思想的交替表现了历史不断前进。但人类思想的发展又不是直线上升的，有时也会有暂时的倒退。因此一种新思潮的出现未必是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指各种社会思潮的不同性质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住的，它们大多是曲折地反映出来的。例如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潮最初却是以文艺复兴思潮表现出来的。当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则夹杂了与它根本对立的五花八门的思潮，如封建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等。可见要识别各种反动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社会思潮的时代性即是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思潮，即使是同一种社会思潮，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社会思潮总是和一定时代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总是表达了一定的社会要求。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主张尊重人的价值，争取人的解放。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看不到这一思潮的社会经济根源，把“人的解放”归结为人的抽象本性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它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其次，社会思潮总是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特点的。任何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只有符合人们的实际利益，为人们普遍接受时，才会逐渐形成社会思潮。当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思想也必然会随之变化，于是就会出现新的社会思潮。特别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也就必然呈现出此起彼伏、纵横交错的态势。因此，只有深入研究社会思潮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

再次，社会思潮是一定时代人类思想水平的标尺，一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往往是与这一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理论思维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吸收了那一时代许多个人的思维成果，而且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承认和接受，才能流行开来。它不只是代表了个人的思想水平，往往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代人的思想水平。因此，它比纯粹以产生了多少思想家、多少理论体系来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想水平更为准确，更为真实。

在当代中国的40年里曾经流行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它们或者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者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或者喧闹了一番便销声匿迹，或者进入了人们心灵的深处，至今仍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因此，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是研究中国国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就无法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向，当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就只能随波逐流，不可能因势利导，使人们摆脱错误思潮的影响，走上正确的思想轨道。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就无法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我们提出的各种目标，方针和政策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无法对人民群众产生凝聚力。领导的决心也就很难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如果不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研究，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被它席卷而去，晕头转向，就不可能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总之，把握社会思潮发展的规律性，密切注视中国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自1987年开始，我们上海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一起，决定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通力合作，开展对中国当代思潮的研究。后来这项研究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我们计划第一步用二三年的时间编选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思潮资料集，使整个研究工作能够奠定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避免那种泛泛而谈的空疏学风。第二步再用二三年的时间

完成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思潮研究系列专著。虽然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但我们愿意为开拓这一新的学术领域而贡献微薄之力。

魏 承 思

1990年3月10日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

编辑说明

我们这里所指的当代从 1949 年始，到 1989 年整整 40 年，其间各方面的社会思潮此伏彼起，历史资料卷帙浩繁。为了最集中、典型地反映 40 年来各种思潮的发生、发展和变迁，“中国当代思潮丛书”背景资料的编辑主要遵循下列原则：

一、代表性。尽量选入某一思潮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是某一思潮早期的源起性文献或思潮发展至高潮时的指导性文献。

二、时序性。文章选编以时序为主，同时兼顾内容，将时间跨度不大、有其逻辑联系的文献编辑在一起。

三、客观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实事求是地编选能反映特定时期、特定思潮的文献。所有入选文献并不包含编者对它的价值判断。

四、全面性。当对某一思潮又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时，尽可能同时收入。

五、以收全文为主，文章特别长而又有许多内容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时，摘录其部分内容。

六、由于篇幅所限，在某一思潮有多篇重要文献而又无法都予以收入时，以存目形式保存未能入选的文献；还有一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是考察各方面思潮的重要历史背景，但为了避免在各卷重复出现，在没有直接关系的分卷内亦以存目形式辑入。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在编选时未能一一征得原作者的同意，特别是有些作者经过历史变化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观点，而我们不能充分反映这种变化，为此，我们对这些作者深表歉意！我

们这里是把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来反映的，而不涉及对任何个人的褒贬或评价。我们相信，有关作者能对此予以谅解和支持。

“中国当代思潮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3月31日

序 言

1949年以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是一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这部历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求人们回答：教育是什么？即教育的性质、教育的功能是什么？教育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教育由谁来领导？在办学形式上，是国家办学，还是民间办学；是统一办学，还是多种模式并举？在教育内容上，是强调理论(间接)知识，还是强调实际(直接)知识？在教育目标上，是强调升学，还是强调就业？连带的问题是，是强调办重点学校，还是强调教育普及？在办学速度上，是主张稳步发展，还是主张跃进？在人才质量上，是强调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统一，还是强调它们的对立？……由于不同时间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因而有不同的理论回答和教育实践活动，这就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总体特色，就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潮。

建国伊始，我们面临着接管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全新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的长文中，更具体地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体现教育的人民性，当时主要采取了以下5个方面的改革措施：(1)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2)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同时并举的

“三轨制”，为工农特别是工农干部提供受教育的机会；(3)所有设施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4)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5)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便更切实地为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这一过程大致到1952年底结束。

由于三种类型学校同时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但也遇到了盲目发展和盲乱现象的问题，似以1953年开始了以“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为方针的对教育的整顿工作。那么整顿的标准是什么呢？今后教育如何发展？这就出现了从1953年——1957年教育上的最中心的主题——学习苏联。

1953年起，我们陆续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时，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是，它应率先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但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现成经验，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样本。在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性质都是相同的，苏联的教育是最先进的，今日的苏联，就是明日的中国。这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提出了今后的三大任务：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第二、要学习苏联；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从此，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学习苏联的热潮。教育在“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口号下，模仿甚至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就顺理成章了。其时，大量引进苏联的教学大纲、教科书，仅高校翻译出版的教材就有1391种，邀请苏联专家讲学、参加学校管理，仿照苏联的学校管理模式，根据苏联的教育理论指导我们的教育工作。

苏联教育理论对我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无疑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一时它在我国几乎取得了准法律的地位。它对我国教育思想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原则。它强调学校的国家性、统一性、非宗教性、男女平权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教育目的。它规定培养全面发展的成员为教育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最主要的途径则是掌握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的各科知

识，并实现“门门五分”。

教学为主的思想。它强调智育的首要性，认为德育主要也是通过教学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就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材、课堂活动、传授知识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苏联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传统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学术模式”，它在培养专门人才、系统地传授书本的知识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它为社会按部就班地发展，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选拔机制。在形式上，它是把教育和学校、和班级教学、和读书等同起来，它的中心任务是获得知识。相应地，资格和证书、考试和淘汰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刻板的因循守旧的制度和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它限制了课程的范围，限制了学生的生活，教学活动缺乏生气，整个教学活动成了攀登教育阶梯的、追求指定标准的刻板过程，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被严重地忽视了。这一模式的另一明显缺陷表现为，受教育的人数受到了严格限制，非规范化、非制度化的教育形式得不到承认，甚至受到排斥。

1957年特别是1958年以后，上述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也日益加剧。于是，我们开始抛弃苏联的教育模式，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中国人未来社会理想的教育模式。一场新的教育探索与变革开始了。

这次变革以毛泽东的有关教育论述为出发点，可以说，毛泽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热情的杰出政治家之一，1958年以后，他一直对教育十分关注，理解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对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思潮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总结了老解放区的教育传统，加上他对国情特别是“反右”以后国情的新认识，提出了他对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构想：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①

①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
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①

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②

这些，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特征以及实现它的途径提供了总体思路，正如当时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8)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经由共产党领导。”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贯彻上述教育方针的要点：在一切学校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办学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实行党委领导下教育专门队伍和人民群众结合，学校内部和教工、学生群众结合。这些方针与当时“大跃进”的形势相配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

从勤工俭学到大炼钢铁。

勤工俭学始于1957年，目的在于克服轻视劳动的思想，后来被提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措施”的高度来认识。对学生劳动时间的限制遂被冲破，到1958年9月，中等以上各级各类学校及小学高年级师生开始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的三秋劳动。这年9月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有22100所各级各类学校建起小炼铁炉、炼钢炉86000多座。

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

这被看做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创举，往往在几昼夜之间，一个学校内就办起几个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和作坊。10月中旬20个省市的统计，有397所高校共办工厂7240座；13000多所中学共办工厂144000座。同时，许多学校办到厂里，由工厂

①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② 《光明日报》，1958年8月19日。

统一管理。

教育制度和教学制度的大改革。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它不仅被看做是解决我国教育事业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学习要求矛盾的好办法，而且被看做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

在改革教育制度的同时，课程安排、教材设置、教学方法也进行了大改革。“三结合”编写教材，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教学方法，“现场教学”、“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毕业设计，等等。

思想、学术领域的大批判。

师生中大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的红专大辩论，同时也展开了对凯洛夫教育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据《光明日报》1958年10月1日报道：1—8月，全国扫除文盲9千万，比8年来扫盲总数多两倍；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3.9%；本年新建中学26000所，新办学校860所。河南省鄆县白坡乡，由57年的4所小学（1所完小）一下子发展到29所小学、4所中学；南京市7天办了263所职业中学。

50年代末的这次改革尝试，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它告诫人们，热情不能代替科学，主观愿望不能违背客观可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教育事业是行不通的。所以1961年以后教育进入了调整、恢复和稳定发展阶段。

1960年底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了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会议检查和批评了文教战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集中研究了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全国重点高校工作会议决定实现“四定”（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强调通过调整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压缩了学校规模和数量。至1963年，全国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合并为407所，在校生由96万压缩